

後真理時代的 四大考驗

撰文 Joseph Epstein | 插圖 Davide Bonazzi

我最近才知道有四大考驗，它是扶輪的核心原則之一。在今天，當真實——或者更確切地說，誠實——似乎在公共生活中逐漸失去聲望時，四大考驗特別令人感興趣。



要找到例子不難。美國參議院有位現任議員聲稱曾在越南作戰，但其實沒有。這一重大謊言似乎並沒有阻礙他再連任參議院議員，也沒有阻礙他繼續對政治對手做出嚴厲的道德判斷。我們的現任總統，對吹牛和誇張的品味，似乎超出了我們過去用來區別真實與欺騙之分的言詞準確性和精確性的正常範圍。無論你到哪裡，四大考驗中的第一項——「是否一切屬於真實？」——似乎越來越岌岌可危，越來越可能被時代潮流淹沒。

詩人瑪麗安·摩爾 Marianne Moore 認為，「遣詞用字貼切是熱情、勤奮和拒絕欺騙的結果。」拒絕欺騙是一個簡單但雄偉的短語，讓人回想起格列佛遊記中的慧駟國那些聰明的馬沒有用「謊言」這個詞，而是用了「未曾存在過的東西」來代替。

說「未曾存在過的東西」已經成為一種小小的專門領域，幾乎成了專業。所謂「帶風向」——這個詞深受政治家、公關專家和其他人的尊敬，對他們來說，真實往往帶給他們嚴重的不便——除了以一種有利於當下自己的立場、

需要或動機的方式來扭曲真相，還有什麼含意？

還有就是「敘述」這個詞的新定義。敘述曾經意味著，簡單地說，「對相關事件的口頭或書面描述；一個故事。」近年來，「敘述」這個詞只不過是描述那些事件的「我的版本」。正如歷史學家威爾弗雷德·麥克萊恩 Wilfred M. McClay 所寫的那樣，敘述「提供了一種中立地談論[事件]的方式，同時使自己不必去考慮事實的真實性。」如今，有幾位電影明星以及一位最高法院法官都聲稱，或者被指責，「改變敘述。」莫妮卡·萊溫斯基在浮華世界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她打算「收回我的敘述，給自己的過去一個目的」——經過這麼多年，她和任何人一樣，這樣做可能是有道理的。

讓我們不要忘記當代「重新創造」自己的概念，好像人們透過改變工作、鄰里、配偶，便能容易地擺脫他們的個性，他們的性格，他們生活中以前發生過的一切。我自己也一直喜歡這句與重新創造自己的觀念相矛盾話：無論何往，即是所在。

帶風向、敘述的新定義、以及重新創造自己的概念，都是相對主義的一部分。相對主義主張，在數學和某些物理定律之外，沒有核心真理，只有被誤以為是真理的各

種競爭版本。在相對主義下，一種觀點可能不像另一種觀點那樣博學多聞，但沒有一種觀點、宗教或哲學能壟斷真理。也就是說，這一切都相對於、取決於一個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或生活中的地位。真理對於在當代高等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相對主義者來說，這個詞沒有什麼分量，沒有真正的權威。當然，對於我們這些相信真理的人來說，捍衛真理的更大理由當然是四大考驗背後的主要意圖之一。

第二項考驗——「是否各方得到公平？」——當然是與第一項密不可分。真理可能是困難的、累人的、痛苦的、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但如果不公平，那就不太真實了。因為真實是公正的，無私的，本質上沒有偏袒——因此是公平的。如果你在判斷或聲明中不公平，那麼根據事實，你當然是不誠實的，如果你是誠實的，那麼根據事實，你當然也是公平的。真實和公平這兩項考驗，並不是一個跟隨另一個，而是像訓練有素的馬一樣並駕齊驅。第三匹馬，湊齊三駕馬車，就要問：「我是否以應有的複雜性來對待我談論的主題？」

往往當我們認為自己是誠實的時候，我們卻是不公平的。在政治上尤其如此。政治從未為真理提供肥沃的土地；完全相反。可能沒有任何一個

團體的一貫誠實性像政治家們那樣受到注意。原因是政治似乎不允許中立；在政治上，人們經常被要求——更精確的說，是「被迫」——選邊站。一旦他們這樣做了，他們那一版的真理就會染上顏色，很可能無法公平對待與自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若有激情涉入其中，真理和公平是最難以捉摸的，而且很少有比政治更容易引起激情的事。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政治辯論的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種美德：如果你是左派，那麼社會正義的美德便是你的核心信仰；政治爭論之所以能比任何其他話題更迅速讓彼此叫囂起來，原因在於政治爭論實際為美德理念之爭。攻擊我的政治，便是攻擊我的美德。

那麼，怎麼辦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牢記第三和第四項考驗背後那種奮發向上的衝勁。即便政治熱情澎湃，也唯有關注真理和公平的宗旨，你才有可能增建親善和建立友誼，以及兼顧各方利益。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然而，我懷疑我們的國家如此分裂，我們的政治如此分裂，原因在於四大考驗背後的精神大都被全國所拋棄。

歷史證明，促進親善友誼比對兼顧所有人的利益更困難。想想歷史上偉大的真理英雄：蘇格拉底、伽利略、焦爾

達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等。這些人的真理在他們的時代並未輕易舉被接受——蘇格拉底被迫自殺、伽利略被教會下封口令，布魯諾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倒吊著活活燒死——但他們的思想後來被認為是西洋哲學與科學的核心。

在任何時候，很少有人能像蘇格拉底、伽利略和布魯諾那樣，做一個追求真理的巨人。用瑪麗安·摩爾的

話說，我們大多數人頂多只能指望「拒絕欺騙」。18世紀的愛爾蘭哲學家喬治·柏克萊 George Berkeley 主教寫道：「很少有人思考；然而，人人都有意見。」培養區別思想和意見的能力或許是邁向真理和公平的第一步，但這並不容易。第二步很可能是培養某種超然態度，讓人們能超脫自己，屏除自己的個人利益，去看真理。

19世紀哲學家亞瑟·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在他的作品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中，以「崇高」這個概念，去描述他所謂的「崇高的性格」：

因此，這樣的性格會純粹客觀地看待人，而不是根據別人可能與他的意志的關係來看待人。例如，他會觀察他們的缺點，甚至他們對自己的仇恨和不公正，而不會因此而激起仇恨之心。他將想到他們的幸福，而不感到嫉妒，認識他們的優秀素質，而不渴望與他們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看到美女，而不渴望獲得她們。他個人的幸福或不幸福不會對他造成激烈的影響。…因為，在他自己的生活和不幸的過程中，他會較少關注自己個人的命運，而會給予全人類的命運較大的關注，因此在這方面會表現得像一個有知識的人而不是一個受苦者。

談到四大考驗，叔本華這位最悲情的哲學家和最有智慧的悲觀主義者，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扶輪社員。

約瑟夫·愛普斯坦 Joseph Epstein 最新出版的書《魅力：無法言喻的魔力》(Charm: The Elusive Enchantment) 於2018年10月由里昂出版社出版。

